阿南造字

邵毅平

阿南认字甚早，主要得力于阿南娘自成体系的家教观：不是说做人要追求“诗和远方”吗？诗当然是“鹅鹅鹅”了，远方么，还能有什么比地图更远方（且更省钱）的呢？于是买一幅中国地图，再买一幅世界地图，往墙上一贴，让阿南自己神游，也省得他烦人。阿南倒也喜欢，常一看老半天。但看着看着，他就很想知道，这块红的是哪里，那块绿的是何处。爷娘照例不耐烦。求人不如求己，他就自己认字。古人认字始于《千字文》，阿南认字始于看地图，完全不顾认字须由易而难的规律，以致后来把“绝句”读成了“缅甸”……

阿南以自己认字多而自豪，每逢有人问他认得多少字，他都会报出极精确的数字：一千三百四十七个，一千五百六十九个……阿南爷总疑心他随口乱说，他却申辩说自己数过的，他记着账呢。他总是记许多的账，各国领土面积、人口数字，按大小多少排序……无事忙。

然而没多久，他就不满足于认字，而是开始造字了。他造的字没有简单的，结构都异常复杂，看上去像西夏字，很高级的样子，除了他自己，没有人认得。即便他自己，也不是每次都认得的。即便他认出来了，每次的写法、发音、释义，好像也都不一样。汉字造字法，有所谓的“六书”，也就是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；他的造字法，似乎在六书以外，还有第七书，可唤作“随心”。

据说当年仓颉造字的时候，天雨粟，鬼夜哭，也就是天上掉下馅饼（粮食），鬼在夜里痛哭。现在鬼哭当然是失传了，但厄尔尼诺还是有的。阿南造字的时候，阿南爷也留心过天气，有时虽不至于掉馅饼（那种好事是三代以前才有的吧），但的确往往风雨大作，尤其是碰到台风天气。但上海本来雨水、台风就多，阿南爷也不敢肯定，它们一定是阿南造字引起的。可老天爷的事，谁又说得准呢？不管怎么说，什么蝴蝶在太平洋上扇扇翅膀，上海这边就会刮起台风的说法，阿南爷一向是嗤之以鼻的。有时候阿南爷出门办事，老天爷突然变脸，下起天气预报中没有的雨来，阿南爷正好没带伞，就会很生气，疑心阿南又在造字了。回家一问，果然是的，钟点若合符契。

流年暗换，阿南早已不再造字，而是只写认得的字，并且写得中规中矩，听说还颇招人待见。阿南爷每有“拙著”问世，也总是烦他题写书名。别人若问是哪位老先生的墨宝，阿南爷就会得意地回答“舍儿”，还解嘲说好处是可以免付润笔。

不过在阿南爷心里，光会写字，而不是造字，只能说是孙行者戴上了紧箍咒，泯然众人而已。阿南爷怀念那个美好的纯真年代，那时候阿南头大身体小，赤着膊流着汗，在台风天里奋力造着字。

现在，尽管阿南不再造字了，造的字也早成天书了，台风却还是每年会来。每当此时，阿南爷就会想，也许哪家的孩子正在造字呢！于是就留心观察天上，看有否掉馅饼的迹象。

烟波渔隐（中国画） 华远

别了，花果山庄

朱全弟

从陌生到熟悉，两三天，感觉热乎了，彼此有亲近感了，进入高潮却又到了离别之际。

2019年6月18日下午，雾灵山下的花果山庄，庭院里少了一点喧嚷，静寂之中的空旷，没有生气。石桌上，那一束从山上摘下来插在瓶子里的山丹丹花，还没有完全枯萎，但是枝梢明显提不起劲头来了。那些石凳，无人再坐其上，个个空空如也，一如脸色惨白，许是也伤感了吧！

早晨，来自内蒙古乌海的老作家梁存喜夫妇告别，提前一天走，到北京看望儿孙。陕西咸阳青年作家范墩子也要回了，他已写了几十万字的小说，还有一篇发在了《人民文学》上。现在，他做着文学刊物的编辑工作。那对夫妇的含蓄与从容，我想，不在大草原上历练过不会有这种神情。梁老师中等身材，说话间总是笑意盈盈，让人感到亲切。他有黧黑的肤色，一头依然潇洒的黑发，一来二往，就叫我老弟了，这是一个心胸像草原一样宽广和坦诚的汉子。他的成就是几百万字的长篇小说、报告文学和散文，几乎囊括了内蒙古自治区所有的最高文学奖项。他的贤内助、那位干练却随和的妻子还当过派出所所长，分局刑侦队的侦察员。至于那个墩子，其实是个笔名，他瘦削颀长，一派阳光的脸上架上了黑色的眼镜，陡然增添了几分书卷气。我们坐在大槐树下的凳子上，他喜欢爬上树坐在粗大的树杈上。我戏说他是回归，他还真的喜欢传统的文化，不请自到居高临下加入了谈话。他的参与不仅是刷新了我们的平均年龄，更是传递了年轻一代作家的价值取向，似乎让老作家感觉到了他们所走过的路，也是有意义并有传承的。

短暂的相聚，我们推选山西作家白占全担纲班长重任。与其自我调侃相反，他是稳健、负责和乐于付出的人，临时组合，20多位来自全国多地的作家们，在十天时间内没有发出一次不和谐的声音。事后才知道，作为从基层走来的吕梁地区的白占全，2014年发表长篇历史小说《下柳林》，随后被改编成经典抗战影片。曾经荣获山西赵树理文学奖的他，最近一部杀青的长篇小说《肥田粉》刚出版即获好评。

有纯文学，民俗文化，儿童文化，英雄儿女各千秋。这句话，出自受人尊敬的原辽宁省文学院院长、作家、学者高海涛老师。

一日，参观兴隆县安子岭乡诗上庄，从这里走出了儿童文学作家刘章等4位中国作协会员，还有6位省作协会员。从山上，走下来二男一女，个子最高的傅洋洋，说着话脸上就泛起了绯红色。村庄里人很少，逮着了，岂肯放过？何况是可爱的小学生！说着说着，我们队伍中的年长者高淑英老师来了，七十六岁高龄的她，却说得一口童真的普通话，很快和孩子们聊上了。她问：同学们，你们会不会背诵“比尾巴”啊？原来这是小学一年级里的课文，三位小学生很快完整地背了下来。高老师又问：“雪地里的小画家？”也没问题，照样背出来。这时，高老师的老爱人程宏明老先生过来了。远在深山有知音，他们的歌谣被孩子们一字不差全文背诵下来，两位都是从事儿童文学的老作家伉俪高兴地笑了起来。

我迅速地拿出了记事簿，请程宏明老师写下三个小学生的名字，他又写了一句“葵花朵朵向阳开”的祝福。我轻轻地撕下，这一页纸也许会影响和鼓励孩子们的一生。不是吗？28岁的范墩子就悄悄地告诉我，他就是读着程宏明老师的课文成长起来的。

别了，花果山庄。我们各奔东西，依然兴奋和怀念，因为相聚并看到了文学最直观的力量。

婚姻故事

刘伟馨

电影《婚姻故事》一开始，画外音便是夫妻双方对对方的评价，配上剪辑的日常画面。丈夫认为：妻子让人感到自在，遇到棘手的家庭琐事，很快能够解决，作为母亲，会陪儿子玩耍，她是一个好演员……妻子认为：丈夫无所畏惧，从不会因为别人的观点或任何挫折而放弃自己想做的事，在纽约做戏剧导演，让所有人有归属感……从生活，到家庭，到事业，对方在自己眼里，简直完美无缺。

查理（亚当·德赖弗饰），戏剧导演；妮可（斯嘉丽·约翰逊饰），原先的电影演员，现在演戏剧。这真的是一对模范夫妻？当切入一个全景，我们才恍然大悟，原来，这对夫妻在闹离婚，在调解人的要求下，各自写一封给对方的信，历数对方美好的一面。调解人原本想让他们各自宣读自己写的信，最终遭到妮可的拒绝。

这是一个吸引人的开场，我们都很好奇：既然对方在自己的心目中评价不低，为什么还要离婚？让我们先看看妮可对她的律师是怎么说的。原来，当初不入流的电影演员妮可和戏剧导演查理相爱，然后结婚，生孩子，放弃演电影改演戏剧。妮可认为，自己渐渐失去光彩，而查理却日渐受欢迎，她没能为自己活着，只是成了查理的养料。更让她不满的是，她接了一个电视剧的试播集，以为自己打开了一片天地，有了自我存在的价值，却遭到丈夫的嘲笑。这让妮可坚定了离婚的念头。

我们有理由看看查理的表现，这个戏剧导演，造就了妮可，但他确实把自己的事业放在第一位；他爱家庭也爱妮可，但他确实忽略了妮可内心的感受。妮可曾经说过，当她受邀参演试播剧，假如查理能给她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并为她的冒险感到无比激动，那么他们就可能不会离婚了。查理自私吗？以自我为中心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但在离婚这件事上，他似乎不是主动的。查理和妮可本来没有打算请律师，当妮可把离婚文件交到他面前时，他还是有点突然。他被迫去找律师，开始的这个律师，竭尽贬低妮可，要她付抚养费，询问她是否吸毒，骂她婊子，全被查理否决，妮可在他心目中不是这样的。

本片导演是拍摄过《弗兰西丝·哈》的诺亚·鲍姆巴赫，在执导《鱿鱼和鲸》时，他曾说过：“我试图制作出一个忠实于经验的电影，而不只是靠情节来驱动电影。”或许诺亚自己离过婚，所以他的这部有关离婚的婚姻电影，有着来自生活的真实感和许多小细节。比如，在已分居的情形下，查理还是忍不住指出妮可演戏中的不足；妮可在将要提交离婚文件给查理之际，得知查理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，表示出由衷的高兴；夜晚，查理为儿子读故事，躺在床上的妮可不由自主地流下眼泪；在和律师协调离婚午餐时间，连查理自己都不知道吃什么，而妮可却为他点了他喜欢吃的餐；妮可为查理剪乱蓬蓬的头发；离婚后，当查理抱着儿子离开，被妮可叫住，她蹲下身子为他系松了的鞋带……

如此温情，并不意味着闹离婚的夫妻一直心平气和，本片有一段将近十分钟的争吵，可能是现实最真实的翻版。开始聊天还算平和，各自感到找律师对簿公堂有点过火；渐渐地，都为自己开脱，说着自己的理由，指责对方的不是；后来，揭了对方的底，有些怒气；不知不觉中，把对方的父母拿出来说事；再后来，怒气冲天，怨恨的话语脱口而出；到最后，恶语相向、诅咒、谩骂，不可收拾；等到双方意识到过头了，又哭着，抱着，说着对不起……此时此刻，我们都在心里问：谁对了？谁错了？他们是不是都争强好胜？是不是都没有顾及对方的感受？是不是不甘或不愿为对方改变自己？

结尾，查理终于在不经意间，读到了影片开头妮可不愿读的她那封信，让查理几度哽咽，“我对他一见钟情……我永远不会停止爱他，即使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”。看到这里，谁的心里，都会五味杂陈。

读碟

关外唐（外一则）

任溶溶

京戏有南麒北马关外唐之说，南麒是麒麟童，即周信芳，北马是马连良，而关外的唐什么倒想不起来了。他好像来上海演出过，是演关公之类人物，不知记得准否。查资料，唐是唐韵笙。我记得的并不差。他当时在上海也大受欢迎。

三岔口

京戏《三岔口》的故事是孟良住进刘利华的黑店，任棠惠为了保护孟良，也住了进来。最后任棠惠为了保护孟良与黑店老板刘利华开打。这是京戏的一出好戏，特别是李少春与叶盛章拍档演出的，我看过简直有六七次。在明亮灯光中二人开打，观众都想像成是在黑暗中开打，碰到了才知道对方就在眼前，妙极了。所以出国演出，这戏总是带出去，洋人怎么会对京戏不佩服呢！

后来这戏改造了，改为两人是误会开打，都是好人。据说叶盛章再不演此戏，因为里面出刘利华洋相的戏放在好人身上不合适，真是可惜。不过后来我也没看过这出戏。

空姐指着红嘴唇

陆幸生

问路和找人，是记者的两个基本功。问路，是为了到达实地采访；找人，是确认第一信息源。在国内，做到这两件事，大抵还是能办到的。但在开放年代，面对“英语世界”，我这个中学学俄文，大学依旧学俄文的人，那就难了。

2001年9月，我去美国采访。洛杉矶有个知青联谊会，成员多为当年下乡到黑龙江的知青，辗转来到美国“洋插队”，多年后他们集结文字，在上海出版了挺厚实的一本书，名叫《三色土——旅美知青的故事》。我应邀写了书评，数月后，洋插队知青发函邀请我和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去美国，出席这本书在当地的首发式。

首发式结束，按朋友们指点，“走走看看美国”。先飞到纽约，机翼下的曼哈顿灯火辉煌，绿莹莹的摩天高塔，似乎伸出手去就可摸到它的楼顶。第二天，乘大巴去华盛顿；11日清晨来到白宫草坪的栏杆外边排队，等候参观。而当天爆发的“911袭击世贸大厦”恐怖事件，将我们连夜驱赶回到纽约，而那世贸大厦已是一堆废墟。

经“紧急呼救”，“入住”纽约的文汇报办事处，我赶写纪实文字，连同照片一并发回上海。一周后，得到上海东方航空重启洛杉矶航班的消息，我们拿着“过期机票”，从纽约赶往洛杉矶。不料想大型客机却在圣地亚哥降落，须转乘小飞机，再飞目的地。面对不可抗拒的紧急措施，机上人全体默然。

不到20人的小飞机，停在洛杉矶机场的一个角落里。一位同行的亚裔旅客告诉说，可乘坐“不同”的小巴士，去往各自的候机点。在“无限广阔”的机场大地的另一边，很远很远处有栋水泥楼，有半个飞机尾翼露出头来，那上面画有东方航空公司的图案。我的心怦怦地跳动起来。然而，怎么才能“走到东方”那儿去呢？

时有巴士车停靠，而我们没敢上车。如果乘错车，命运又将把我们拉往何处？有几位美国空姐拉着航空箱走过来，那是刚才乘坐的小飞机上的空乘人员。我上前说话，先用手指着自己，再指指对方：OK？我自说自话的意思是，我们认识，是吧？领头的中年美国空姐神色迷惘。我再继续指着自己说：China，ShangHai。她认可地点了头。

我的心又剧烈跳动起来，用手指向“远方”的候机大厅，口中直呼“东方”。美国空姐脸上露出理解的表情，我紧跟着再说，巴士？再双手一摊，表示出自己不知该乘哪一辆车才对。那位美国空姐的表情凝固了，突然，她的眼神灵动起来，说道：bus？这个音节我听懂了；只见她用右手指着我同行的女编辑抹了口红的嘴唇，大声说：OK？OK！

在那个瞬间，我的思维无比混乱。终于，我恍然大悟，她是在说：乘坐红色或有红色标记的巴士过去，就可以。于是，我也对着她接二连三地“OK”起来。来了一辆车，她们先走了，剩下我们两个中国人，再度四顾惘然。

一会儿，开来一辆“浅红色”车身的巴士，我的心再次怦怦跳动，怀着最强烈的“拼搏”精神，决然上车。终于，巴士停靠在候机大厅门口，踏进厅堂，只见穿着东方航空标识制服的男女服务员站在柜台前；我立停，发现剧烈跳动过三次的心，现在“不跳”了。

如是的异国问路，迄今仅此一次，但愿永远只此一次。

十日谈

人生第一次

责编：龚建星 殷健灵

“读书就是回家”成为一种新的办学理念，要做有温度的教育。